

# 社会学与 社会心理学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 编  
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



工人出版社

175172



2 020 1630 8

# 说 明

G02 82/3

《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一书是根据《人民日报》在职干部新闻研究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讲座的讲稿选编而成的。现由《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和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教务处作为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教学参考书正式出版。

1983年,《人民日报》举办了一期在职干部新闻研究班,特地开设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讲座。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也为两届研究生开设了同样内容的讲座。应聘授课的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袁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康,中央民族学院陈家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室主任宋书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孙昌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徐联仓、李沂,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孙观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黄育馥等同志。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市社科所社会学室、中国社会学学会、北京市社会学学会联合创办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以适应社会对社会学日益增长的需求。鉴于目前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奇缺的状况,我们决定将这些讲稿整理出版。由于篇幅的限制,并考虑到读者对象,有几篇讲稿未选入,在此谨向主讲者致歉。另有几篇尊重作者意见未选入。

《人民日报》社部分同志参加了讲稿的整理工作,在此表示感谢。所选诸篇最后由《人民日报》王锦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两同志做了进一步加工整理,有些篇章作了删节。选编过程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教务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目 录

说明	( 1 )
新闻工作和社会调查	费孝通( 1 )
社会学研究些什么	王 康( 20 )
社会学的产生和传入	王 康( 66 )
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	雷洁琼( 98 )
谈谈我国的人口问题	袁 方(113)
我国劳动就业问题	袁 方(125)
从社会整体角度观察青少年犯罪问题	宋书伟(135)
谈谈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永龄(145)
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王 康(167)
社会心理学的创建和发展	孙昌龄(179)
人的社会化	黄育馥(192)
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现状	李 沂(224)

# 新闻工作和社会调查

费孝通

什么叫新闻？就是新鲜的事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能够及时传播的消息。报纸以新闻为主体。记者、编辑的任务就是及时地向群众报道、传播新闻。这就要求编辑、记者要快，要抢时间。一般来说，记者的时间观念是很强的。我们现在有些记者时间观念不强，新闻往往成了旧闻。有人说有的报纸是“政府公报”。就是说在你的报上看到的新闻太少，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

记者、编辑要了解读者，要知道他们希望从报纸上了解什么，得到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看报。满足这个要求，你的报才能卖出去。在国外，不象我们这里叫大家一定要订报，而是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几分钱出来买报。他看了报，就对他一天的事情产生特殊的影响。这一环接一环互相影响下去，报纸便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有的外国人，一拿起报纸首先看后面的股票行情。我们的报纸读者，先看什么，什么时候看，在什么情况下看，这也是很具体的。一定要使报纸成为生活中必需的一部分，那就行了。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你不要买股票，也不要这样那样，但看报纸总要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一套要研究，要调查。现在我们的报纸什么时候送到家？我家里每天要到十一点钟才拿到报，吃了午饭我要赶紧休息一会，不会去看报。要到晚上别人看电视了，我才看报。先看《参考消息》，接着再看《人民日报》。各种人看报的习惯都不同，看的内容也不同，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你们要研究这

些情况。不要关门办报，不能上级说你办得不错就可以了。看来对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自己，多少人象我这样，我不知道。那种半版以上的长篇大论有几个人看？

你们对于新闻工作，知道的比我多，你们现在要了解自己所做的事，以及它在社会上发生的作用，了解一下别的有关的学科是有好处的。

新闻同社会学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也说不准确。我们人与人共同生活在社会里，你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的活动。自然现象也是通过人的活动来报道的。比如地震，你光报地震，人家不听，但你报了死多少人，人家就听了。对于人，你要认识他，才能去报道他。你们的报道有时间性。我用两年的时间去研究一个问题，人家不会说时间长。你们用两年时间去搞个报道，恐怕不行。你们不需要我们这种内容，时间、重点也不同。

我今天就讲讲我是怎样去调查研究的，问题是怎样发现的，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在调查过程中我的认识有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对你们或许会有所帮助。

调查有两种。我反对先有结论，后去调查。这不是笑话，有的人就是拿着现成的结论去作调查的。我举个例子，一个少数民族称不称少数民族，这叫民族识别。现在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几千人的，有几万人的，有自己的名称，并说自己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单位，想单独成立一个民族。这就要去识别它，看它是不是能够作为单一的民族，这就要作调查。有一次，一个研究工作者来找我，说某某地方要求成为一个民族，他问我上边意见怎样。我说，领导知道了还要让你去调查干什么？他是我的学生，我们很熟，所以他才赤裸裸地提出问题。有的时候，有些人口袋里放着两种意见，看看上边你要哪一个，我就给你哪一个。这不是调查，而是反调查，是“四人帮”的办法，是一种反科学的方法。调查是反映客观实际的，尽管我们的反映不可能十分准确，甚至可能有出入，这都是可以的。但总之不能先有结论。

我赞成科学的调查。一次，民主同盟要搞个多学科性的学术讲座，要我讲一课社会调查。我不准备讲怎样调查、怎样统计，我就讲我这一生搞过多少调查，每次怎么搞的，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体会。这样讲了能对人家有好处。介绍一个学科，你要学，不能从成果来学。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家的文章是已经从经验中积累出来的。他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想到这个题目后又怎样去做，你是摸不到的。你只看到成果，看不到过程，看不到思想活动的过程，学术研究的过程。理科有实验，还可以看看怎样操作。文科就不行。一个人写小说，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红楼梦》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没人看见，也记录不下来。一个社会理论，为什么要这么讲？为什么马克思能看出资本主义要灭亡？这有个过程，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思想过程。早年的马克思与后来的马克思也有不同，这就是在变化。毛主席也是在变化，他思想也是在变。变化有一个过程，我们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一直主张，要真正了解研究者的思想活动过程，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限度。我们要去认识社会，去认识什么？怎么去认识？为什么要认识？我们整天在社会里生活，都不知道。为什么把妈妈叫作妈妈？为什么不把别的人叫妈妈，而把生自己的那个人叫妈妈？为什么到中午我们就要吃饭？为什么人大了就要结婚？女大当嫁，男大当婚。这些问题我们都不会去问的。在社会里，我们要问，要看，但看什么，怎么看，这里面学问很大。你们搞新闻的也是这样。你要报道什么，你怎么去看，怎样去准确反映，准确到什么程度，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在这方面，我们有相同的地方。

以现身说法来讲社会学，以前恐怕没人讲过。我今天就讲讲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的体会。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是去年年初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它的历史的客观条件。去年年初，中央有个决定，要调查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就是说，要检查一下三中全会之后，是不是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在落实政策中有什么困难。要我们民主党派去做这项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地位，调查的人一定要知道

自己是处在什么地位上去做这项工作的。我是民主同盟的成员，要我协助党去检查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发现知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从建国以来就有争执的问题。这个历史你们都知道。到三中全会之后，逐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大家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没有现代知识。究竟我们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对于自然界，对于社会的认识不够科学。就是说，我们用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反映客观实际不够，人家看得到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比如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先进了。前两天《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说是美国要发展反导弹导弹，这从理论上讲完全是可能的，只是需要一种新的计算机，能在一秒钟内计算上亿次。这标明将有新一代计算机出现，问题是日本还是美国先研制出来。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同几个朋友谈话，他们说，新的计算机小到普通人可以放在身边用。从大型到微型的变化，它的性能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对于社会的认识，它的时间就更长。现在我们遇到的还是老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特点在哪儿？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怎样不同？这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抓不住，不认识它，不能反映这个客观的东西。社会知识落后于自然知识，这是全人类的问题。有些东西，在国内的中国人落后于在国外的中国人。所以，搞现代化没有知识不行。知识在哪里？它在人的头脑里。这就比较复杂了。知识还没有能脱离人的头脑，用计算机储存起来。不过，把已经有的知识，储存起来，是可能的，可以成为事实。在今后二三十年里，人类文化要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知识是靠人去掌握的，人死了就没有了。知识是从有人类以来，从钻木取火，茹毛饮血，同自然界的接触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可是主要靠人的脑子来储存。这个矛盾很厉害。知识要靠知识分子来储存，来传播，来创造。现在，我们花了很大代价发现了，要存在于这个世界里，不能不具备现代的知识。还有很多人还

不清楚，可是我们的领导人清楚了。这就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不是空的，不是说以前划了右派，冤枉你了，这些都不是，而是在历史的变化中得到的教训。知识由人来掌握，这人就是知识分子。宪法中写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当时争论很大，最后，通过的宪法把这一点写进去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提出了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接下去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发挥？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清楚的，要一视同仁，有困难要照顾他们。首先一条，过去的错案、冤案要平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一系列政策，我们认为是对的，要搞现代化不这么做不行。这些政策落实了没有？为什么不落实？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课题。这个课题不是我们在房子里能解决的。我们回想一下1957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扩大化？扩大化是以小概全，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当时没有正确反映出来，究竟有多少。现在知道了，有百分之九十几扩大化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少有一点，就是没有客观反映事实。当时知识分子的状况不象当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就是说，认识脱离了实际，成了错误的认识。现在我们要正确反映知识分子客观存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问题在哪里，这就要一方面检查政策，一方面要调查。民主党派中包括了很大数量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民盟就有三万。通过这些政治组织，就可以比较容易取得和反映真实的情况。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去调查的。我们搞的社会科学是密切联系实际的，是与国家的事务相联系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家叫你是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不是科学，而是反科学的，是四人帮搞的逼供信。这不能反映客观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我们要科学地调查，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是唯物主义的，要反映客观实际，不能歪曲事实。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西方现在的社会科学，讲客观主义，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不讲客观不行，一不讲



客观就不能科学化丁。他们要提客观，我们不反对，提客观好，可以不要跟着资本家走。但我们不能用他们的话，我们要反映客观实际。首先有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人的脑子里的东西。人是去反映它，人头脑里的东西作为客观实际的反映是可以的，但不能从天上降下来，不能凭空想象。真正要改变客观实际，只有通过认真地去认识，找到它的规律。我们讲不要违反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说要科学，要马列主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条也适用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了解知识分子究竟怎么样。在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注意中年知识分子。前一个时期，一提到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人（包括领导，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看不到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这一组人，好象他们不包括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人里面。这是客观存在。在我们自己，在民主党派里工作的人，有这样一个看法，好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在上层。当时这样认识是有客观原因的。去年的中央文件第一次特别提到了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多人去调查。民盟派我去调查，有历史的原因，因为五十年代我就搞这个问题，给总理建议，成立一个专家局，这是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行政机构。它管理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齐燕铭同志当局长，我担任他的副手。我就出去调查，提出两个建议，要有业务档案，谁有什么专长，当时我叫作智力勘察。第一个问题就碰了个钉子，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早春天气》，这个问题牵连了很多人，因为我这篇《早春天气》，很多人死了。只要你说过一句话，《早春天气》写得好，就划成右派，就给处分，年纪轻的，就到北大荒，有很多就死了。当时不懂，以为是我们的罪行，牵连了許多人，现在事情搞清楚了。这样就希望我再出去跑一趟，特别是去西南。要搞清楚，究竟是谁的责任，是我的《早春天气》写得人家死了，还是人家用了这本书的话被搞死了。同时我希望了解现在知识分子的情况，这是要调查的。我就考虑到，怎样进行调查，首先是什么是调查，什么是认识，通过什么去认识，这些都是基本问

题，不能只用脑筋去想。人的脑筋是封闭的，只有听到看到才行，这就是直接知识。毛主席讲直接知识是基础。所有的知识都要用直接知识来说明。假如一个人色盲，分不清红绿，你跟他讲红灯他不懂，他就没有办法来适应这种红绿灯，只能用另外一种办法来适应。他不可能有这种红绿的概念。你可以描写各种红，什么红光满面，他想象不出，因为他没有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从一个一个人的生活里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要去了解别人的事情，而要了解，是要通过你自己的感情，才能懂得人家的感情。情感要通过共同的语言，一套符号才能表达出来，而表达出来要引起你所需要人家发生的认识和感情。最基本的就是，通过直接接触所得到的感受，从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社会性的概念。这一过程，毛主席用两个字来说明：“飞跃”。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是怎么飞跃的？“飞”是一种比喻，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心理学、哲学的认识论所要研究的。你自己没有这种感受的，很难真正理解人家的感受。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我在1957年有一系列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调查报告。总理认为这些报告是很好的。为什么我当时能在一两个月的短时间内能把住当时知识分子的脉搏，把当时知识分子的感受表达出来了，不但认识它，而且表达出来了。靠什么呢？靠我自己有这么一种感觉。1957年时我四十七岁，正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一批，是在解放前从大学毕业出来而在解放初期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一批人。我的感受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所以，人家讲上半句话，我就知道下半句要说什么。我有时说笑话，说钱伟长眼睛动一动我就知道要说什么了。你们也是这样，在老朋友中间，不要都说穿，不要都讲大道理，这都不需要。只要动动眼睛，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经验。所以知己嘛，容易懂。当然我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只能代表一部分，我很容易懂得我自己的朋友。所以毛主席那时讲，你交了二百个朋友，但去交一些工人朋友就好了。你躲在知识分子中间，结果把自己搞下去了。那是指我在知识分子中间串联。我是用自己的经验到人家身上去

证明对不对,有没有,这就总结出来了。报告一出来,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因为说的东西既是我的也是他们的。这些调查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点很重要。为什么毛主席对农民能这么了解,他是从他脑子中得出来的。当时不容易,他顶住了第三国际王明路线的搞城市起义的路线,而转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大问题。当时毛主席被打击得够厉害的。他自己对我说,我的帽子有多少层呀,你才戴了一个。这些都是真话。他代表了中国农民的真正要求,认识中国农民中的力量,这确实了不起。走这条路,我们中国革命成功了。毛主席充分理解了农民,为什么别人不行呢?没有一点基础不行。可是他对于现代东西不熟悉,犯了主观主义。这是后话。我们要认识东西,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那就要有你自己的基础。不能光靠自己的东西,要广泛地接触,要核实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这一层知识分子共同的东西,还是我自己的特殊部分。有时会把自己的特殊性东西变成一般性的,那就靠我们调查了。1957年我的调查,我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从我自己的感受,设身处地地想到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主要成份。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反映,他们的想法,通过这一调查表达出来了。后来我把它写成《早春天气》就出了问题。我当时的调查主要在这一层,要解决的问题也主要在这一层,并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这一次出去,首先我要了解,我是现在的我,不是1957年时的我。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1957年时的知识分子,是经过一个大的变化的。当时已是1982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要调查别人先要了解自己。我凭什么能理解人家?人家接触你不是接触空的,你不能穿着一件看不着的隐身衣去。你是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去的,人家对你有什么反映呢?我以民主党派的一个负责人下去,我有我的历史,这大家都知道。在这样情况下你能得到什么?假如你自己估计不清楚,那你就不能真正反映客观实际。因为我们不是一面没有色彩的镜子。我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有一定

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对方对我有一定的看法。在这里要了解客观存在的对方的实际情况，所以第一条，我认为我不能用1957年的办法。我还有我的朋友，同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到昆明，我一下飞机就去找他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他们的话我还是都懂得，不用讲，大家拉拉手，从拉手的轻重中就可以感到他们的感情。这是很重要的。我听李维汉同志说，他同少数民族的领袖们接触，一拉手，从拉手的份量中就知道对方怎么样。的确，这要有经验。可是我不了解四十八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问题不能用我们的问题来概括，而象我这样的人，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队伍中是极少数。以极少数去了解大多数，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没有一种死的方式，首先要决定于你同被调查的人的关系。根据双方相对的差别，才能决定你采取什么方式接近客观实际。不可能全面反映。反映人的事情，要多方面，用各种办法，交叉地来了解，所以要靠大家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进行。我经过初步了解，接触，决定采用谈话的办法，去登门拜访。毛主席当时可以召开调查会，叫大家一起来，因为他是党的领导人，通过党的组织，可以叫这一地方的几个人来，同他们谈。可是他还说，有的老头儿，一定要去看他们。我们要尊重人家，要叫人家信任你，不能搞“四人帮”那种外调。我们大家都有经验，我是被外调的人，我不可能讲真话，讲了真话我要害我的朋友，我要想法搞得他没办法。我不能讲真话，因为没有信任是不行的。因此，要建立信任，使他知道这件事对他是有好处的，没有这个不行。这种信任很重要，在西方社会你搞调查要花钱。去访问，人家也不一定讲的都是假话，可是你要花钱，同你讲了几十分钟，开了个条子给你，你就得给钱。这叫谈话费。有的地方甚至有职业的被访问者，专门应付那批调查人，甚至在同一个地方的调查，会出现两个相反的结果。问题在于找了谁，花了多少钱，同他关系怎样。所以，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调查者可以同被调查人一致，被调查人可以成为主角。因为被调查人知道事情，他信任你，那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合作，你出题目，他可以讲。

我在少数民族中调查时，感觉到这一点，而且做到这一点。在五十年代，少数民族的群众真是一片诚心，什么话都要同你讲，问题就讲得出来。少数民族比较朴实，没有顾虑，当时还有阶级矛盾。所以我说调查人与被调查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能得到多少真实性的东西。说得太夸大了也不对。有很多私人的事情不愿同你讲，我们也不必要问。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应当是对他有利的，对社会有利的。有的事情不必去问，不能太过份，过份了他就不会信任你。要同情人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个人同社会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因此，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限度，就是我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在这种条件能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比如，最近我到南京去作家庭调查，是由公安学校同我们合作搞的。公安学校的校长是最早找到我们社会学门上的人。他说，公安的目的是共同的安全，抓人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做到不要抓人。所以要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引起不安定的原因在哪里，做预防性的、综合性的治理。他讲得很对，我是支持他的。所以我们深入一个街道，进行家庭调查。我就跟他们去了，我说，什么人也不要跟着我，我只要一个调查员就行。他是穿公安服装的，这一点，你不能骗人。你是公安局的人，就以公安人员身份出现。这首先是考验你，你的公安工作做得怎样。如果人家看看你这套公安制服就害怕，那你的公安工作就没做好。你对被调查者欺骗，他也欺骗你，这是必然的。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我说，我要看你是怎么调查的。不要管我，你尽管做你的事情。你要处之泰然。我们四个人，一个公安学校的人，我和我的一个助手，还有一个街道的负责人，就去调查了。到了一个人家里，拿着一张调查表，按着调查表的问题问。这张调查表有什么用处？这是一张进场的入场券呢，还是一个门槛。在一个家庭，有个老头，是招女婿的，住了三间房。人老了，半瘫痪。这里的家长是个女的，是医生，那天请假在家。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要考大学，一个在校念书。我们问她有多少钱。一个小女孩指着房里的老头说，他才有

钱。孩子的妈妈赶紧说，他已退休了，有退休金多少。接着又问，他的退休金是不是归你们管。那个女的说，在过节改善伙食时，他就拿钱出来。这样问下去，家庭结构慢慢就出来了。很清楚，老头有一笔钱在手上，他要用这笔钱在这个家里占住他的地位。这笔钱不能轻易全部给他儿女用。拿去后给不给他，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要掌握这笔钱，来巩固在家中的地位。而他的女儿有个面子问题，不好说。第三代说他有钱，她不满意他有钱不拿出来。这时你可以问下去了。可是我们的调查员因为调查表上没有了，就不问了。你已入场了，你可以了解这个家庭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是门槛到了，他不能进去了，因为调查表上没有了。所以我要说，调查表究竟是一张入场券呢还是一个门槛。很多问题我们不能深入进去，到了好处就放走了。中国是个父系社会。可是这个上门女婿在家里的地位到了老了还没有巩固，还要靠他的退休金在那里作保证。中国父系社会的力量达到了什么程度，要有个量，这就是个很好的材料。可是调查的人脑子里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明确自己在某种身份下去调查能达到什么结果。不知道你们心中有没有数。你们知不知道我是怎样接待你们《人民日报》记者的？《人民日报》记者在被访问的人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不决定于你一个人。他的变化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人民日报》记者下去，人家抓住你，什么话都跟你说，那么《人民日报》的地位就不同了。我有经验。我们有个调查基础，一天我先去看了看，不准备做调查。可是他们知道了社会科学院有人来调查，我一进去就叫他们包围了。一个老太太抓住我不放，讲了两个钟头，我得听。她的确有很多东西，没有地方讲。今天有社会科学院的人来，她要把她所有的东西都讲出来，但讲不清楚，复杂极了。如我有时间，我就花一个星期慢慢地听。她从怎样嫁到这个地方起，怎样同她的老伴打架离婚，后来女儿、儿子又怎样，一家的事情都讲。这对于社会调查太好了。可是你要耐心，不能为写一篇文章而去。那天我有很多事情，没时间了，她还要讲，听都听不

清，大概表情不是那么太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做调查工作的人，还要靠自己，取得他的信任。你假不得。人同人的关系，人是最聪明，最敏锐的，不说，心里也明白你这个人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是敷衍还是认真的。不要以为只有自己聪明，人人都象你一样聪明，眼睛厉害得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好象都有触角一样。所以要建立信任，要靠你自己是不是理直气壮地去为人民利益工作。我在清华研究院学习的时候，开始学量人的身体。不是量出来的数字都准确。站的姿势不同，量出来的身高就不同，可以差一厘米，那么在我们数据上相差很远。因为人是活的，怎样能保证测量准确，老师教我，只有一条，你自己要站稳，你稳人家才能稳。你自己动摇，人家马上感觉到。你自己要坦然，的确是为了一个事业，决不能把研究的对象作为我们的工具，作为为你服务、榨取知识的对象，那就不行。毛主席讲得很对，要把他当作老师看，不要好为人师，不要以为自己都懂。为什么会准确，深度怎样，要看你的修养、品格。要把人当人看，而不要当东西看。你要取得他的合作，首先要尊重他。调查的好坏，取决于你的经验，态度和为人，对事业的忠诚。我们搞的是人的科学，是人去研究人。所以这次我下去调查知识分子问题，首先承认我同中年知识分子有个差距。承认了这个差距，你就可以克服它。所以我要了解在中年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光是问一两个人不行。我采取了一个量的办法，即发出问卷。我把道理讲出来，现在为什么要进行这项工作，而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对于中年知识分子了解不够，我没有很多共同的经验，我接触的只是我女儿，女儿同其他人不同，所以我就发出一批问卷。这问卷的答案是我没想到的。里面有一个问题：你感觉到什么是干扰你工作最大的因素？回答最多的是家务工作太忙。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务工作确实不得了。我也搞过家务工作。可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60元钱，当时还没有加钱，双职工，一共120元钱，一般有一至二个孩子，上面还有父母，老的小的，回到家里，没有地方，要做饭，要买煤，还要排队，一排半个

小时。这个门一打开，问题就象山一样，滚滚而来。中年知识分子谈不到其他的，谈不到要进修，一去进修，离开家，家里怎么办？我们还停留在什么信任不够，使用不当这上面。这样一调查我们就紧急呼吁，政协就派代表团去上海。上海住的房子你们恐怕没看见过。我去参观过，就象轮船里边的统舱一样。如在清华大学，前八年，赵丹带我去看闻一多以前住的地方。我到清华去一看，吃了一惊，我以前确实没看见过。以前一家住的地方，现在住四、五家。都是讲师。近来情况可能有些改善。萨空了的一个调查团到上海，把住房情况录了像，拿到中央，放给中央领导看，说你们看看人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客观实际确实反映出来了，抓住一个当时知识分子急于要改变的问题。假如用老办法去谈，可能谈不到这些，感受不会那么深。我也不会那么准确地去反映这些问题，恰如其份地指出其重要性。尽管我的住房并不宽余，但跟他们相比，至少没有两层床。现在清华、北大两层床还有不少，还有三层的，有三代人住一起的，当中拉一块布，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这种生活，怎能谈到业务提高呢？所以说，调查要抓问题。调查的人要认识到，我能看到什么，能发现什么，自己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假如我一去就用1957年的办法，反映出来的只是老知识分子的问题。老知识分子的情况很清楚，现在工作很积极，因为快要死了，要把东西拿出来，有的东西希望不要失传了。知识分子之所以宝贵，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知识。人家认为不值钱的东西，他认为是宝贝，因为他花了一生的功夫在上面，想把它留在人间，传给后代。中年知识分子还想不到这一点，钱也不够，现在多一点还是很紧，还有房子。房子就引出不少问题，如分配不均，为教师盖的房子，给那批干部占了，教师和干部之间的矛盾很厉害。要作分析，要钻到里面去。为什么我能看到这一点，那首先靠的是自己的“短处”，即承认假如我不采取其他办法，我就不能了解中年知识分子。但不能靠接触接触就算了。所以我发出一批表，用计算机一下就算出了比例，其结果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想到的。就去看，越看越清楚。这样，虽然不可能完全正



确，但大概也抓住了当时的要害。是不是这样，还要经过考验。现在怎么样，事情还要发展。我一回来，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干部脑筋里，在知识分子脑筋里，看成是个人的事。知识分子认为我吃了亏，受了冤了。干部认为对不起那个人，这是好的。坏的则是认为，政策下来，没有办法，就给你一点东西吧！总是把事情看成一个一个人的，谁被划了右派，谁受了冤。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看成这样一件事，当然做不好。在去年夏天，我看整个空气就是这样。我们以前讲人才，是从正面讲，讲一个一个人，谁有本领，要赶紧提拔出来。对呀，知识在头脑里，离开人就没有知识。有的人脑袋里储存得多，有的储存的少。最近这一年多来，有个新的提法，就是不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看成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问题，叫智力资源。从知识分子问题到智力资源问题，我叫它是个飞跃，是个变化。我出去时有人问我，什么叫知识分子？谁是知识分子？什么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不是知识分子以前被划了右派，或受了冤，改正了就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要搞知识分子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归有个知识的总数，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数量问题。我们缺少了，就要补。要实现现代化，知识分子只是这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政协提出，不要忘记我们有两亿三千万文盲。这表示资源太差了。十亿人里只有六百万大学毕业生，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不是为了替几个知识分子打抱不平的问题，而是我们损失了智力资源，因此，要赶紧把他们这些智力用出来，为大家所有。现在这六百万大学程度的人，我们没有发挥他们毕业后的智力作用。现在提出了怎么使用的问题，怎么提高的问题，怎么更新的问题。不这样做，应付不了我们的局面。家务要减轻，生活要改善，要增加工资，这是前提，必须要做到的。为什么呢？不是为了对这批人好一些。有好多工人想不通，知识分子加工资我们也要加。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翻不了